

---

# 试论国共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关系

莫岳云 郭铁

---

半个世纪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对打败日本侵略者起了重大的作用。以往的关于抗日游击战史的研究中似有偏颇。台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抗日战争史论著中,只字不提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而是攻击共产党“破坏抗战”、“抢夺地盘”。在大陆,学术界长期以来只着重于共产党敌后游击战的研究,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研究甚少。其实,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分别领导了敌后游击战争。本文拟就此作研讨。

## 一 国共两党分别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

有关中国抗日战争中,在广大的敌后地区,国共两党分别领导游击战争的情况,我们有以下几点总的认识。

其一,不仅有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也有国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按照1937年8月南京国防会议的分工,国民党担负正面战场抵抗任务,中共军队负责在敌后侧击日军。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决定:八路军着重向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战场,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于是,八路军大踏步地挺进敌后,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国民党主要担负正面战场抗敌任务,但是在正面防御作战失利的情况下,也曾有一部分正规军留驻敌后作战。第一、第二、第五战区等都部署了大股部队留驻敌后。在河北,省保安队两旅改编的第一八一师留驻冀南,万福麟的第五十三军和孙殿英部进入太行山南

部地区,张荫梧统领的河北民军也在冀南晋西地区活动。在山西,太原失守后,国民党的15个军(约30多个师)全部转入山区,阎锡山按原行政区划了七个游击区,除了第一游击区是八路军的活动区外,其余六个全是国民党军的活动区。在山东,鲁西南有孙桐萱率领的第三军团,鲁南有庞炳勋的第四十军。此外,还有山东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组织的抗日武装,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秦启荣组织的鲁冀边游击司令部,青岛市长沈鸿烈率海军陆战队和地方武装也在鲁中抗战。在江苏,有省主席韩德勤率领的第八十九军,缪征流的第五十七军以及李明扬、李长江分别为正副总指挥的苏皖游击队和陈泰运的税警团。截至1938年底,国民党在敌后战场各种武装力量有六七十万人。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突然收缩兵力以巩固后方,除受共产党敌后游击战所迫外,国民党敌后武装对其造成威胁也是一个原因。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当局决定加强敌后,布置了相当于60个师的兵力在敌后坚持抗战,并在敌后各战区成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敌后党政工作。

其二,不仅仅共产党开展游击战争,国民党也开展游击战争。1937年冬在武汉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出了“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的建议,被蒋介石采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sup>①</sup>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开展,有力地配合着正面战场的作战。陈诚分析过台儿庄大捷“战略上成功的原因”：“目下敌军在中国境内战场者(东北四省不算),共计有55万人,而参加台儿庄会战,不过五六万。彼何以不抽调他处兵力增援?此盖我国采用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小部,袭击其后方,即如山西境内,我方有20万之游击队,遂使敌五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沿线,不敢离铁道一步,其他平汉线以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战场自顾不暇,遑言抽调,以远水救近火乎?故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上我军努力之总和……简

<sup>①</sup> 《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304页。

言之，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sup>①</sup> 陈诚所说的游击战，实际上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整个游击战，因为在山西境内，在 1938 年春，共产党游击队远未达“20 万”之众。

武汉、广州沦陷后，蒋介石进一步强调游击战问题。1938 年冬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sup>②</sup> 之后，国民党军变更了战斗系列，1/3 用于正面战场，1/3 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1/3 在后方整训。并增设了冀察和苏鲁两个敌后游击战区，令第五十一军挺进山东，令第六十九军、新八军和第九十九军挺进河北，以加强游击力量。与此同时，各战区也划分了若干地方为游击区，指定部队开展游击战争。这样，国民党军开始了由初期的零星游击向有组织的敌后游击战的转变，出现了游击战蓬勃发展的局面。

为了适应游击战的需要，国民党政府军委会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还编写了《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教材与实施游击战之依据。该书共 14 篇 389 条及纲领 9 项，对游击战的组织与领导、根据地的创建与扩展、游击队之政治工作以及通信联络补充给养等都作了详尽的说明。可见，国民党对游击战还是比较重视的。

其三，不仅仅共产党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军也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军在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开辟了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和海南游击区。同时，还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华北有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恒山根据地；华东和华中有鲁东南与沂蒙山、日照山之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之根据地；华

① 陈诚：《台儿庄我军歼敌经过》，《扫荡报》，1938 年 4 月 12—13 日。

② 《中日战争史略》，台湾正中书局 1986 年版，第 433 页。

南有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海南根据地。<sup>①</sup>当然,国民党军的抗日根据地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有着不少质的差异,这一点,下文还会谈及。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也曾发挥过作用。抗战初期,国民党敌后部队作战比较努力,牵制了大量日军,也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既延长了作战时间,使敌陷入中国持久抗战的泥沼之中;又扩大了作战空间,消耗了敌人的兵力,达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大规模地加强敌后武装,把战区引向沦陷区,不但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摆脱地盘日益缩小及兵源不足之窘境,而且使部分沦陷区国民党政权得以恢复,从而使国民政府的政令得以执行。在国民党敌后战场上,许多将士英勇杀敌,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动人事迹。如山东省政府委员兼第六区行政督察员范筑先、陆军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第二十四师师长寸性奇、沂水游击司令刘震东、东北游击司令唐聚五、皖北游击副总指挥雷忠等高级将领,都战死沙场,以鲜血和生命激励着敌后军民的抗日斗争。

由以上论述可见,敌后抗日战争应该包括两个部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和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

## 二 国共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战的相互关系

同处于敌后抗日战场的国共两党武装力量,虽然是自成体系、各自为战,但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携手和摩擦相交织,合作与斗争贯穿始终。国共携手合作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和主流,敌后国共两党游击战争的关系首先是合作关系。

国民党开展敌后游击战,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共产党的影响。1937年9月,晋北冀西战事吃紧,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sup>①</sup> 《白崇禧回忆录》,第279—296页。

身份,于27日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建议:河北友军亟宜背靠太行山脉,转移侧面作战,并与八路军联络,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请转告张(荫梧)先生,对河北民训工作即放手去做,特重在武装民众,组织当地游击战争,配合大军。<sup>①</sup>白崇禧是国民党游击战的首倡者,这年冬天他在武汉军事会议上提出开展游击战的倡议,这是否与周恩来的建议有关,我们无从查证,但是有两个事实为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线索:(一)周恩来关于国民党开展游击战的建议在前,白崇禧在军事会议上倡议开展游击战在后;周的电报是打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白是军委会的副总参谋长,周的建议他不会不知道。(二)当白崇禧在武汉军事会议上倡议国民党开展游击战时,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国军未演习过游击战”,担心打不好。白崇禧辩驳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是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亦能打游击战。”<sup>②</sup>胡宗南也说过:“要打日本,只有采取八路军的办法。”关麟征也曾说:“只有用红军打我们的战术,才能打倒日本。”<sup>③</sup>由此可见,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开展与共产党的影响分不开。

国民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武汉沦陷前,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朱德曾在会上提出国共两党共同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并要求拟定计划。其后,由周恩来、叶剑英共同研究拟出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1939年2月15日,游干班在南岳正式开学,汤恩伯为游干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陈诚兼任副主任,汤恩伯改任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叶剑英任副教育长。中国共产党派到南岳参加游击干部训练工作的有30多人,主要负责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游击战的政治工作这两门主要课程的

① 唐培吉等主编:《两次国共合作史稿》,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3页。

② 《白崇禧回忆录》,第304页。

③ 转引自《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146页。

教授和训练。他们以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为指导，结合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游击战的实践经验来讲授，深受学员欢迎。南岳游干班先后办了七期，毕业学员 5659 名<sup>①</sup>，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

山西是国民党游击战开展得比较早也比较好的地区，主要原因是两党实行了较好的合作。周恩来、彭德怀在给毛泽东和洛甫的电报中曾说到：山西战略地位重要，可成为抗战重心，有红军主力，阎锡山与我合作抗日，将可造成数百万人的游击战争。<sup>②</sup> 1937 年 9 月，两党合作建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以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为主任委员，中共及八路军代表有邓小平、彭雪枫、南汉宸和程子华等。战动总会始终以动员群众、组建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作为主要任务。到 1938 年，包括察绥游击军在内，战动总会共建了 2000 多个基干游击队，中共抽调了大批党员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和充任骨干。山西的游击战争搞得轰轰烈烈。

敌后战场两党的抗日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呈现一种犬牙交错的状态，双方互为犄角，相得益彰。彼此间的合作主要是战略上的相互配合，同时，也有战役、战斗的相互配合。

1938 年初，驻守山西的国民党军处于很困难的地位，蒋介石、阎锡山把一部分部署在山西前线的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共同组成第二战区东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3 月 24 日，朱德在沁县小东岭村召开了东路军高级将领会议，国民党军方面有曾万钟、李家钰、李默庵、高桂滋、赵寿山、武士敏、朱怀冰、王奇峰等人参加。国共双方将领交流了经验，共同制定了统一对敌的作战方针。4 月，东路军国共两党军队联合作战，粉碎了日军 3 万余人企图摧毁太行山腹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歼敌 4000 余人，收复敌占县城

①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载《民国档案》1991 年第 3 期。

②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战动总会简史》，天津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7 页。

18座,取得了辉煌的战果。<sup>①</sup>

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对正太路、平汉路等地的敌军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破袭战。这次大战得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慰勉和敌后国民党军的策应。蒋介石致电朱德和彭德怀:“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sup>②</sup>9月7日,蒋介石下达训令:“各战区应以十八集团军此次在正太、同蒲、平汉各路之游击破坏动作为法则,拟定自本年九月起至十二月止之持久计划,加强敌后游击战。”“在此游击期间,其第一要义,务使敌军不能抽调其在各地区之部队。”<sup>③</sup>他还专门电令华北敌后各部积极策应百团大战。于是,太行山的庞炳勋部、吕梁山的阎锡山部、中条山的卫立煌部在华北南部向日军发动了攻势。对此,军委会军令部9月20日关于第二战区有关部队作战的战报,和熊斌9月22日关于第二战区部队策应百团大战作战战况致蒋介石等人的电报中都有叙述。其中提到:范汉杰的第二十七军各师向晋城发起猛攻,一度攻入城内,毙敌200余,缴获机枪、步枪30余支,并将晋城东北郊百官村之守敌歼灭过半;裴昌会的第九军猛攻博晋公路沿线之敌并将晋城西南方附近公路破坏;刘戡的第九十三军各师分攻长治、高平及阳城各近郊,破敌粮弹车50余辆,第十师将阳城西南近郊外围各据点攻占;第十五军攻占西涧后,即刻与敌在郇王附近激战……<sup>④</sup>对于国民党的积极配合,共产党方面也给予充分的肯定。《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十期上的《论百团大战及其胜利》一文中说:“这次战役虽以正太路为中心,但北至大青山、古北口,东至海滨,西起管涔山,南至中条山都有军队参加或配合动作。”<sup>⑤</sup>刘伯承也谈到:“此次百团大战胜利消息传出后,各地友军不断函电慰勉,最近在晋南及中条山一带的中央

① 向文瑞:《粉碎日寇九路围攻晋东南纪实》,载《山西文物》1983年第1期。

② ③ 《百团大战历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232、240—241页。

④ 《百团大战历史资料选编》,第471页。

⑤ 《百团大战历史资料选编》,第468页。

军,在卫司令长官英明指挥下,积极出动,一致配合作战,消息传来,令人感奋不已。<sup>①</sup> 尽管国民党军对百团大战的支持和配合是有限的(主要是前期配合),但仍然值得称道。

坚持大别山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国共两党军队,也曾有过较好的合作。新桂系一位将领回忆说:“对于敌后情况,新桂系部队掌握得少,大多是高敬亭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供给的。大江南北的交通,新四军派有专门部队维持,经常畅通无阻。”“新桂系军政人员渡江,常靠新四军部队的掩护。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视察大别山的新四军部队,途经‘立煌’时,我们还请他来干部训练班演讲。”<sup>②</sup> 1939年端午节,靠新四军提供的情报和掩护,大别山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对安庆城的日军发动了一次成功的袭击战,大煞了敌人的威风。1942年12月中旬,日军对国民党军大别山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战”,一个月之内,大别山地区的麻城、罗田、浠水、广济、英山、黄梅、宿松等重要城镇相继丢失,根据地的“首府”立煌也一度沦陷。在此危急之际,新四军军长陈毅指示新四军五师等部,“保卫华中,保卫大别山,鄂豫皖边区(与友军)共同坚持敌后抗战”。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12月下旬至1943年1月上旬,在保卫大别山的战斗中,新四军对敌作战40余次,歼敌1000余人。由于国共两党军队积极配合作战,迫使敌军于1943年中旬从大别山根据地撤退。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具有双重性:具有爱国的一面,因而能联共抗日;但同时又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统治的立场,因而又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方针。蒋介石惧共仇共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面对中共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人民武装力量的猛烈发展,蒋介石忧心忡忡,力图限制与削弱之。1939年后,蒋介石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加强国民党敌后武装力量,除了抗击日寇一面外,还

① 《新中华报》,1940年10月27日。

② 陈良佑:《新桂系统治安徽初期的片段回忆》,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



隐含着抑制共产党力量在敌后迅速发展的一面。国民党第四十八军参谋长李盛宗曾说过：“二十一集团军以大别山为根据地，‘立煌’为核心，向陇海、津浦沿线及皖西、鄂东沿江据点之敌经常进行游击，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大别山根据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则是为了对付共产党领导的鄂、豫、皖边区的新四军。因此，兵力部署是有两面性的。”<sup>①</sup> 白崇禧在谈及“冀省游击战”时也曾说：我军“于太行山东南要地实施游击，支持达五年之久，牵制敌人，防止中共政权组织，对抗战贡献殊大”。<sup>②</sup> 两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十分明白地道出了国民党敌后战场兵力部署的两面性。

如果说，抗战初期同处于敌后的国民党军能与共产党军队紧密合作的话，那么，随着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关于“溶共、防共、限共”方针的确定以及《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游击队调整办法》和《处理游击队业务划分权责办法》等文件的出台，两党敌后合作的程度便迅速地减弱和降低了，摩擦事件开始出现并逐步频繁起来。先有冀省保安司令部的“博野事件”，接着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相继发生，然后就是1939年底至1940年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1939年底，晋省的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集中六个军向八路军和中共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进攻，捣毁沁水等七个县的抗日政权。1940年2月，石友三部队进攻冀南的八路军；3月，国民党朱怀冰部、庞炳勋部和张荫梧部又向太行山地区的八路军进攻。1940年10月，鲁苏战区的韩德勤部为独霸苏北，把在该地区进行游击战的新四军消灭或挤走，调动1.5万兵力向新四军进攻，引发了“黄桥战役”。大别山地区的李品仙部也向皖北的新四军袭击。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把反共摩擦活动再次推向高潮。对于国民党敌后部队

① 李宗盛：《第二十一集团军在安徽》，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

② 《白崇禧回忆录》，第280页。

制造的反共摩擦活动，八路军新四军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打退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国民党当年以至今日出版的史书都把“摩擦”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说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军令”统一、“扩大地盘”，这实在是毫无道理的。当初，毛泽东号召广泛地发动游击战争，但他并不主张游击战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展。他说：“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sup>①</sup>他指出：“游击战和根据地应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sup>②</sup>这就规定了凡日军铁蹄所到之处，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抗日武装皆有发动游击战争、收复失地之责。共产党既要抗战就必然要发展人民武装力量，既要向日寇手中收复失地，自然会扩大地盘，而国民党却要限制人民武装力量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于是，两党的摩擦和反摩擦斗争便发生了。

综观整个抗日战争过程，我们认为，敌后战场国共两党的抗日战争，既统一又各自独立。由于中日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国共两党的主要任务都是抗击日寇，因此，敌后战场国共两党抗日游击战互相配合、互相协助和互相依存的关系，始终占着主导地位。而彼此间的矛盾、摩擦和斗争，则居于次要地位。有些文章只强调敌后战场国民党军的存在增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的困难，这多少有些片面，是只看到彼此“摩擦”的一面，而忽视彼此“合作”的一面。实际上，敌后战场国民党游击军的存在，本身对日军就是巨大的威胁。况且，它对八路军还是有帮助的。毛泽东就说过：我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友军的协助是很明显的，没有正面战场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之友军的配合，也不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sup>③</sup>

---

① 《新四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54 页。

③ 《八路军军政杂志》，1938 年 1 月 20 日。

### 三 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两种不同的结局及其原因

经过八年艰苦斗争,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收复了大片的失地,创建了18块敌后抗日根据地(陕甘宁根据地除外),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了120万人,民兵200万人,根据地人口达1亿以上,对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国民党军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则经历一个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过程。据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前的统计,华北、华中敌后的国民党军队约100万人,但不久就陆续垮掉了。1939年成立的冀察、苏鲁两大游击战区,1943年春已不复存在;中条山游击根据地1941年5月为日军所攻占;太行山根据地1943年也落入敌手。除了第五战区的大别山根据地、第二战区的山西游击根据地、浙西游击根据地和海南根据地等少数几块根据地外,其余大都丧失了。为什么同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呢?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国共两党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同。毛泽东认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sup>①</sup>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抗日战争,是广泛的人民战争,它以有利的地形地势为依据,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基础。它主张依靠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民抗战,并采取了一系列依靠群众造福人民的政策,如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政治上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获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八路军、新四军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凭借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采取内线外线相结合的战法,以地方军与群众相结合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纠缠、困扰和消耗敌人,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0页。

以主力军反复穿插寻机歼敌，打破敌之纵深包围。“兵民结合”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铁道游击队、水上雁翎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如雨后春笋；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各显神通，真正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国民党方面，虽然军政部颁布的《游击战纲要》中也要求游击队“爱护民众并组织而训练之，使由亲近而信仰而合作”；要求根据地游击队组织民众分别成立锄奸队、侦察队、向导队、传递队、担架队、宣传队、运输队、守望队、缝补队、少年先锋队、儿童自卫队、武装自卫队等，积极动员民众参加战斗，“使全体民众游击队化”<sup>①</sup>，但是，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始终未能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当然，这并不是说国民党敌后抗战丝毫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初，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府寄予厚望，敌后民众武装大都接受国民党名义上或实际上的指挥，沦陷区人民也积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国民党军开展游击战及建立根据地。但是，敌后国民党政权很快暴露其反动性。政治上，它仍沿用过去的统治方法，一切大权操纵在旧官吏和地主豪绅手中，照样欺压百姓；经济上，它不但没有履行“二五减租”的诺言，相反还横征暴敛，搜刮民财。如李品仙在大别山搜刮民脂民膏不择手段，弄得怨声载道。他曾对其心腹说：“到了抗战胜利后，政治走上轨道即不能乱搞钱了。”<sup>②</sup>言下之意是要趁乱捞一把。阎锡山在山西滥发晋钞8000万元，沈鸿烈也在山东滥发“民生券”，使人民深受其害。老百姓指责敌后国民党军“以游击为名，抢劫是实”，“抗敌不足，殃民有余”。<sup>③</sup>国民党敌后部队逐渐失掉了民心。白崇禧在分析国民党敌后根据地衰落的原因时说：“惟共军宣传共产主义，挑起阶级斗争，以‘穷人翻身’为口号，利用十分之八的农民清算少数地主，组织苏维埃政府，自此，原为国军

① 《游击战纲要》，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编译处1939年编印。

② 张义纯：《新桂系统治安徽概述》，载《广西文史资料》第30期，第296页。

③ 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台北《传记文学》第5卷第1期。

控制的广大农村逐渐变为共军所控制。<sup>①</sup> 其实,抗战期间中共并未清算地主而是实行“减租减息”;也未建立苏维埃而是实行“三三制”。不过白崇禧倒是说出了问题的实质:人民群众支持与否,是敌后抗日游击战兴衰的关键。当叶剑英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上阐发“敌后军民关系犹如鱼水关系”的著名论点时,汤恩伯似乎恍然大悟,他对叶剑英说:“过去(十年内战)我们打你们为什么老打不过呢?一个原因是你们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sup>②</sup> 明白道理是一回事,实际行动又是另一回事。国民党军队的阶级特性与服务宗旨制约着它的行动,使它难以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而脱离了人民群众,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水之鱼,难以生存和发展。

第二,国共两党军队对游击战重视的程度不同。游击战在一般战争中属战术问题,是正规战的辅助手段,而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则不同。中日战争的最大特点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攻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游击战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把它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毛泽东指出: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敌人以少兵临大国,在占领区留下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它与正规战不是战役战斗配合而是战略配合,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并有一整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诸如机动灵活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方针;和正规战相配合的方针;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在反“扫荡”战斗中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相配合的方针;向运动战发展,进行战略反攻的方针等。中共确定,军队作战“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于是,八路军、新四军相策应,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相配合,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与江河湖汊游击战融为一体,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随着游击战的普遍开展,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迅速地发展起来,

① 《白崇禧回忆录》,第278页。

② 廖运泽:《我的片断回忆》,《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26页。

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步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国民党仅仅从战术上简单理解游击战，始终把游击战作为正规战的辅助手段。白崇禧说过：“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1937年武汉军事会议——引者注）中提议：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加强敌后游击。”<sup>①</sup> 蒋介石认为：“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才能够担任。”<sup>②</sup> 虽然，蒋介石曾强调“二期抗战”中“游击战重于正规战”，但实践中仍是以阵地战为主，配合运动战，辅之以游击战。至于游击战的具体战术，《游击战纲要》曾有明示：“游击队之战斗，主在敌军后方行之；以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攻，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乘敌不意，出奇制胜之妙绝，求达扰乱、破坏、牵制、消耗敌人之实力为目的。故攻坚、硬战、死守等，皆力求避免。”<sup>③</sup> 但实际上，国民党在发动敌后游击战时，却过分强调与正面战场配合，忽视了敌后部队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性。敌后游击区的国民党军在对日进攻时则强调规模。春季攻势、冬季攻势，声势虽大，收获却小，消耗了实力。在反日军扫荡时，又采取分兵把口，节节抗击和大兵团作战的打法，有游击战正规化的趋向，打不赢，走不掉，损失惨重。如：卫立煌在中条山，庞炳勋在太行山，于学忠在山东，都进行过较顽强的抵抗，但终究免不了溃败的命运。以中条山为例，中条山游击根据地由卫立煌部驻守，该部挖山采石，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凭借天险进行防守。1941年5月，日军调集六个师团、两个混成旅及一个骑兵旅团，从东、西、北三面围攻中条山。负责中条山守备的何应钦（此时卫立煌在四川受训，其职由何代之）以确保根据地为目的，将主力七个军配置在横广约170公里，纵深为50公里的中条山区内，前依险峻山隘，背靠黄河湍流，凭借构筑的工事，迎战来犯之敌。尽

① 《白崇禧回忆录》，第303页。

② 《蒋总统集》，台北1963年版，第996页。

③ 《游击战纲要》，军事委员会军训部编译处1939年10月编印。

管守军顽强抗敌,但未能采取灵活机动的“敌进我退”、“避实就虚”游击战术,而是“死守”、“硬战”,最后损失惨重,根据地被日军攻占。

第三,国共两党军队抗日态度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的旗帜,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自始至终坚持敌后抗战,即便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时候,也依然把抗日放在第一位,对顽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持团结抗战;无论形势何等严峻,条件何等艰苦,从未动摇过抗日意志。而国民党敌后部队则不同,虽然广大将士能坚持抗日,但也有不少动摇分子。抗战初期,留在敌后的部队尚能比较积极地抗击敌人。但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方针的确定,敌后国民党军把注意力转向反共摩擦上,其结果,既减弱了对日军的攻击,又在摩擦中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而且还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日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说:“蒋努力压制共产党,甚至宁肯一时停止对日军的作战也要加强对共产党的部署”,使两党之矛盾“激化”。<sup>①</sup>于是,日军提出:“利用国共合作中的矛盾,尽量采用宣传、谋略等各种手段,煽动两党之间的摩擦……促使国民党军主动去扑灭共军。”<sup>②</sup>本来,在战争格局上,国民党敌后游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呈犬牙交错状态,对日作战可以互为犄角,敌人不敢轻易进攻。但是“摩擦”战端一开,犬牙交错的格局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分区划界各自为战,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这就削弱了抗日力量,导致了国民党敌后武装的衰落。尤其是1941年至1943年间,在所谓“曲线救国”的幌子下,国民党将领大批投敌,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伪军总数由1941年的35万人激增到1943年的80万人。敌后国民党游击军的“伪化”,直接导致了游击根据地的丢失。以冀察战区为例,1942年1月,石友三在鲁西南阴

① 日本陆军参谋部编:《杉山笔记》上卷,原书房1977年版,第150页。

②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1页。

管守军顽强抗敌,但未能采取灵活机动的“敌进我退”、“避实就虚”游击战术,而是“死守”、“硬战”,最后损失惨重,根据地被日军攻占。

第三,国共两党军队抗日态度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的旗帜,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自始至终坚持敌后抗战,即便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时候,也依然把抗日放在第一位,对顽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持团结抗战;无论形势何等严峻,条件何等艰苦,从未动摇过抗日意志。而国民党敌后部队则不同,虽然广大将士能坚持抗日,但也有不少动摇分子。抗战初期,留在敌后的部队尚能比较积极地抗击敌人。但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方针的确定,敌后国民党军把注意力转向反共摩擦上,其结果,既减弱了对日军的攻击,又在摩擦中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而且还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日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说:“蒋努力压制共产党,甚至宁肯一时停止对日军的作战也要加强对共产党的部署”,使两党之矛盾“激化”。<sup>①</sup>于是,日军提出:“利用国共合作中的矛盾,尽量采用宣传、谋略等各种手段,煽动两党之间的摩擦……促使国民党军主动去扑灭共军。”<sup>②</sup>本来,在战争格局上,国民党敌后游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呈犬牙交错状态,对日作战可以互为犄角,敌人不敢轻易进攻。但是“摩擦”战端一开,犬牙交错的格局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分区划界各自为战,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这就削弱了抗日力量,导致了国民党敌后武装的衰落。尤其是1941年至1943年间,在所谓“曲线救国”的幌子下,国民党将领大批投敌,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伪军总数由1941年的35万人激增到1943年的80万人。敌后国民党游击军的“伪化”,直接导致了游击根据地的丢失。以冀察战区为例,1942年1月,石友三在鲁西南阴

① 日本陆军参谋部编:《杉山笔记》上卷,原书房1977年版,第150页。

②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1页。